

African Socialism; or, the Search for an Indigenous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cerpt I)

By Emmanuel Akyeampong

Translated by WANG Ting

Received: July 7, 2023

Accepted: July 20,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Emmanuel Akyeampong, trans. WANG Ting. (2023). African Socialism; or, the Search for an Indigenous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cerpt 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094–10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1](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1>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perspective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African socialism. Ralph Austin, in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1987), pointed out that few African countries explicitly chose capitalism upon gaining independence. For those countries that did choose capitalism, it became a default or residual mode. “African socialism” was popular in the initial decades following Ghana’s independence and was pursued by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Ghana, Guinea, Senegal, and Tanzania.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e article explores African socialism as a generation’s exploration of an indigenous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generation held contradictory views towards capitalism but approached alignment with the communist camp during the Cold War with caution. Importantly, advocates of African socialism often presented bold and transformative visions for their countries. However, these visions may be worth reconsidering as they do not conform to the socialist model.

Keywords: African socialism; political indepen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Volume 33, Issue 1, 2018.

Notes on the author: Emmanuel Akyeampong is the Ellen Gurney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of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West African history,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disease and medicine, ecology, African diaspora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rade.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WANG Ting is a graduate student studying MTI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t Jis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非洲社會主義

——經濟發展本土模式何以可能？

(節選一)

埃馬紐埃爾·阿基揚龐/文 王婷/譯

摘要：本文主要論述了外國學者對非洲社會主義的看法。拉爾夫·奧斯汀在《非洲經濟史》(1987年)中指出，很少有非洲國家在獨立時明確選擇資本主義，對於那些選擇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說，資本主義是一種默認模式或剩餘模式。「非洲社會主義」在加納獨立後的最初幾十年很流行，包括加納、幾內亞、塞內加爾和坦桑尼亞。在此基礎上，本文探討了非洲社會主義這一代人對資本主義持矛盾態度，但對在冷戰時期被置於共產主義陣營的謹慎態度。重要的是，非洲社會主義的宣導者經常為他們的國家提出大膽而具有改革性的願景。而這些願景可能值得重新審視，因為它並不符合社會主義模式。

關鍵詞：非洲社會主義；政治獨立；經濟發展

來源：原文原載於《發展中地區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2018年第33卷第1期。

作者簡介：埃馬紐埃爾·阿基揚龐(Emmanuel Akyeampong)，系歷史和非洲和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也是哈佛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的艾倫格尼教授。研究重點是西非歷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蘭教、疾病和醫學、生態學、非洲僑民、政治經濟和貿易。

譯者簡介：王婷，吉首大學MTI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

引言

在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和60年代，加納獲得獨立後，非洲民族主義政府發現自己仍處於經濟窘境中。面對剛剛擺脫殖民統治後帶來的對人口的巨大需求，這些新政府只需要一場「革命」就能使他們的國家擺脫幾十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落後的局面。正如帕特裏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巴政府中一位首批內閣部長在巴西爾·戴維森關於非洲民族主義崛起的紀錄片《非洲》中告訴他的那樣，1960年剛果獲得政治獨立時，該國只有三名大學畢業生(Davidson, 1983年)。

通常有兩種經濟模式：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當這些新政府探索資本主義時，往往帶有「新殖民主義」的色彩。因為要是把這些新政府放回西方僑民資本的懷抱，便推翻了政治獨立的所取得的成就。在冷戰的背景下，一提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就會讓人將其與東方集團以及蘇聯和中國等國家畫上等號。20世紀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給「革命」的概念打上了烙印，掩蓋了革命在國家建設中的變革作用。18世紀美國、法國和海地的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非洲民族主義者為了實現經濟上的自力更生，創造了「非洲社

會主義」這一術語。這對其支持者來說,似乎有著不同的含義。然而,當西方將他們歸為蘇聯或中國的陣營時,他們的擁護者對此表示了不適。

本文探討了這樣一種思潮,即非洲社會主義的根源是尋找一種在時間和規模上都具有革命性的本土經濟發展模式。仔細閱讀一些主要支持者的著作,如塞內加爾的利奧波德·桑戈爾或坦桑尼亞的朱利葉斯·尼雷爾,可以看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並非一無所知。事實上,桑戈爾(1964)的《論非洲社會主義》是筆者目力所及範圍內闡釋馬恩思想與著述最為精闢的作品。非洲社會主義的重點對其不同的支持者來說是不同的,這也許反映了每個新國家所面臨的獨特情況。這些非洲民族主義者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重要的方法,但它需要針對非洲的情況進行修改。因為非洲沒有工業化,城市化程度不高,階級鬥爭不是主要矛盾,宗教是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社會主義是一種具有平等主義倫理的方法,可以立足於非洲歷史和文化,因此被稱為「非洲社會主義」。約翰·甘迺迪總統在與幾位非洲新領導人會面後發現,他們本質上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的願望和意圖是發展他們的國家。伊莉莎白·施密特(2013:24)指出:「激進的民族主義經常與共產主義相混淆,或被視為對西方利益的同等威脅。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真實的或想像的——導致美國政府支持許多不光彩的獨裁政權。」在1961年與艾哈邁德·塞庫·杜爾會面後,甘迺迪指示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為幾內亞制定一個適度的援助計畫,並要求塞庫·杜爾停止其社會主義言論。

在本文中,筆者探討了誇梅·恩克魯瑪領導下的加納、艾哈邁德·塞古·杜爾領導下的幾內亞、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領導下的塞內加爾和朱利葉斯·尼雷爾領導下的坦桑尼亞對非洲社會主義的追求及其意圖,這四個有啟發性的事件今天很少被放在一起分析。^①社會主義是探討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思路,可以說,將政治和經濟分開十分困難,然而本文的重點在馬克思主義範式下的經濟學版塊。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出版了一些探討非洲社會主義的作品,其中包括提出「非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們所做出的一些努力(Brockway 1963; Senghor 1964; Onuoha 1965; Nyerere 1968; Babu 1981)。隨著經濟急劇衰退,20世紀80年代被稱為非洲「失去的十年」,非洲社會主義最著名的支持者尼雷爾承認他的烏賈馬(一種農村社會主義組織形式)嘗試已經失敗,並於1985年下臺;1989年蘇聯的解體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勝利。直到最近,才有一些研究結果使得非洲社會主義的願景和實踐得以重新審視,但這些都是單一國家的研究(例如,見Lal 2015; Williams 2016)。顯而易見的是,非洲經濟得到發展仍然是遙遙無期的。不可否認的是,想要實現非洲社會主義仍然面臨著許多經濟和社會挑戰。重新審視非洲社會主義的設想,不是為了將其作為一種實踐或經濟模式並重新採用,而是為了重新激發人們對廣泛變革的渴望。這樣做是否有好處?我們能否好壞一起丟,拋棄不讓任何人掉隊的社會經濟變革的夢想?

一、當前的歷史背景和思想影響

「願景」是指意圖,而「議程」是指發展計畫,非洲的新領導人需要一個發展計畫來幫助他們的公民擺脫貧困和文盲。在當時,非洲的人力和財力資本都非常匱乏。在殖民地之外的非洲殖民地,幾乎不存在實體基礎設施,而現有的一點基礎設施是為開採和出口自然資源,而不是為國家經濟的凝聚力和綜合增長而設計的(Akyeampong 2015)。坦桑尼亞前總統賈卡亞·基奎特在2017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坦桑尼亞獨立時

只有三名醫生和兩名工程師。

二戰後，非洲從殖民國家變成了一個發展型國家，因為它試圖發展殖民地經濟，為人民帶來好處。這一時期被描述為「第二次殖民佔領」，其特點是殖民主義的技術官僚化。殖民者推動了農業實踐的革命，引入了機械化和灌溉技術，探索了新的能源來源，並為第一批進口替代產業奠定了基礎。他們希望通過發展基礎設施，為製造業提供電力，並建立一個運輸系統，使殖民地經濟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在他們的努力下，發展經濟學誕生了，一開始被稱為「殖民經濟學」，因為它專注於熱帶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殖民統治後期對熱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重視解釋了為什麼一些早期的非洲民族主義政府採用了發展經濟政策。發展經濟學的先驅包括西印度人威廉·阿瑟·劉易斯等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曾在倫敦經濟學院接受培訓，並在二戰期間擔任殖民部的顧問。他在殖民部的工作以及他對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殖民經濟的不斷瞭解，促使他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在發展中國家，貧困深刻根深蒂固，資源有限，人口迅速增長，本土中產階級則不存在。劉易斯得出結論，國家必須承擔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角色。國家領導和集中規劃，以及從凱恩斯在大蕭條中學到的教訓，例如國家在基礎設施上的支出作為刺激生產和消費的手段，都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影響。工業化被賦予了主要角色，劉易斯的文章，特別是《擁有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經濟發展》(Lewis 1954)。用他的傳記作者羅伯特·蒂格納(2006:95)的來說，一旦勞動力供應遵循非編社會主義者劉易斯所描述的過程，經濟增長就會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光環」。在 20 世紀 30 年代和 40 年代，幾位非洲領導人曾在英國學習時接觸到費邊主義。本諾·恩杜魯(2008:325)指出，「第一代非洲領導人中最傑出的人(如恩克魯瑪、尼雷爾、卡翁達、肯雅塔、桑戈爾、拉姆古蘭)都支持費邊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和意識形態。」因此，費邊社會主義對非洲社會主義的影響是複雜的。

二戰後的改革運動與冷戰的開始相重疊，歐洲殖民國家試圖說服美國，殖民地對於他們對抗蘇聯是至關重要的。美國通過馬歇爾計畫等政策對西歐的支持給其帶來了新的活力。正如菲利普·穆倫貝克(2012:4)所指出的，艾森豪政府的非洲政策「不過是馬歇爾計畫的延伸，其前提是確保西歐從二戰中恢復時仍能獲得非洲資源」。在政府和私人機構的資金支持下，美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也在制定一個框架，使美國能夠與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和非殖民化國家合作。甘迺迪 1961 年成為總統時，推動了「現代化理論」的發展。「現代化理論」是美國在工業化社會中實現經濟繁榮的藍圖，也是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堡壘。處於現代化理論前沿的幾位美國社會科學家，包括丹尼爾·勒納、大衛·阿普特和塞繆爾·亨廷頓都研究了第三世界。甘迺迪邀請麻省理工學院傑出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羅斯托加入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並主持現代化的議程。羅斯托發起了「甘迺迪發展十年」倡議，其目標是「幫助其他國家學習如何成長」(Muehlenbeck 2012:48)。羅斯托預測了經濟增長的階段，並概述了從自給自足到市場經濟所需的工作。他在 1964 年出版的《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宣言》(Rostow 1964)，強調了冷戰的背景和競賽。

但是，對於現代化的定義是複雜的，因為並不是只有資本主義社會可以聲稱擁有現代化的經濟。尼爾斯·吉爾曼(2003:14)指出：

為了解釋蘇聯如何既與美國(「西方」)相同(「現代」)又不同，現代化理論將共產主義描述為現代性的「病態」或「偏離」形式，並一直希望蘇聯與西方現存的自由主義現代性相「融合」。

具有啟發性的是,現代化理論和共產主義都相信工業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專案和農業的轉型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Scott 1998)。從 1961 年開始,甘迺迪政府放棄了艾森豪對非洲的政策立場。該政策規定只與歐洲殖民者和白人結盟,原因是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認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是蘇聯的產物,並聲稱冷戰時期的中立或不結盟實際上只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Muehlenbeck 2012:3-4)。然而,甘迺迪政府制定了一個基於四項原則的非洲政策:反對歐洲殖民統治,接受非洲不結盟政策,向非洲國家提供經濟發展一攬子計畫,以及新外交(Muehlenbeck 2012:44)。這種微妙的立場解釋了早期實現獨立的非洲的神秘發展,例如世界銀行制定和支持坦桑尼亞早期的「村落化」計畫。

二、非洲獨立後面臨的挑戰

非洲的第一次獨立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實現的。蘇丹於 1956 年獨立,隨後加納於 1957 年獨立,然後是一系列法語國家和尼日利亞於 1960 年獨立。這一趨勢仍在增強,殖民主義旗幟逐年減少,新的非洲獨立國家旗幟逐年增多。「發展」是這些新國家的主要挑戰和目標。發展意味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其關鍵指標包括更好地獲得住房、醫療、教育和工作。然而,許多新的民族國家似乎並未準備好迎接這個巨大的挑戰。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在 1958 年因在公投中投出了著名的「反對」票,反對成為法國殖民地,從而名聲大噪。法國對此採取了報復行動,撤銷了財政和物質支持,法國官員在離開時將幾內亞的記錄、設備和任何可以移動的東西都拿走了,並銷毀了不能移動的東西,甚至連電話線也被切斷。幾內亞於 1958 年 10 月 2 日獲得獨立。1958 年 11 月下旬,恩克魯瑪向幾內亞提供了 1000 萬英鎊的貸款從而救其於水火之中,並且促使加納和幾內亞結盟(Kaba 2017:93)。由於所有的記錄都被銷毀,幾內亞甚至沒有一個可以進行經濟規劃的基準線。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是一名工會成員,從 50 年代初就被美國情報機構標記為共產主義者,他向美國駐幾內亞的第一任大使威廉·阿特伍德表示,幾內亞太窮了,沒法關心意識形態,只關心行動(Muehlenbeck 2012:62)。直到 1994 年 5 月,幾內亞 85% 的就業人口根本沒有受過正規教育,7.3% 的人只受過小學教育,4.5% 的人受過中學教育,只有 1% 的人受過專業培訓或高等教育。2001 年,幾內亞只有 10% 的道路鋪設了路面,0.8% 的農村人口用上了電(Doumbouya & Camara 2008:600,608-609)。

坦噶尼喀在 1961 年獨立時是一個非常貧困的國家。前文已經提到了坦桑尼亞獨立時,醫生和工程師的數量。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在獨立時宣佈,政府現在面臨著三個發展問題:貧窮、疾病和無知。由於這個國家多農村地區,所以農村發展將是重中之重。尼雷爾經常說,坦桑尼亞有土地而沒有資金,所以它的發展計畫必須以土地為導向,因為以資金為基礎的發展必然意味著主要靠外國援助和投資。坦桑尼亞是一個由農村組成的國家,並且許多農村是分散的。為提供社會服務,改善坦桑尼亞人民的生活,尼雷爾主張建立更多的聚集區或「村落化」。這將有助於提供教育、衛生設施、自來水和其他社會設施(Shivji 2010:120-133)。在世界銀行的協助下,坦桑尼亞於 1961 年至 1963 年啟動了第一個三年計畫。坦桑尼亞的法學教授伊薩·希夫吉(2010:121)對這一階段這樣寫道:

世界銀行的村有化計畫的核心是當時盛行的現代化理論。傳統的農民必須加入到國家間的商品迴圈中去。該計畫經過轉型和改進,提出模範農民將留在村莊裏,獲得現代技術,並在管理人員的監督

下耕作。

這一村有化計畫沒有提及坦桑尼亞的殖民經濟結構,即出口初級材料和進口製成品。在這個階段,村有化與其說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不如說是一種提供社會服務的手段。由於各種原因,村有化是一個巨大的失敗(Shivji 2010:121-122)。坦桑尼亞仍然對外國投資開放。1963年至1967年期間,它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約為4.1%(Mwase & Ndulu 2008)。

但尼雷爾對此並不滿意。坦桑尼亞經濟學家恩孔德·姆瓦塞和本諾·恩杜盧(2008:431)表示:

政府對工業增長的速度和普通坦桑尼亞人從獨立中受益的程度並不滿意。它強調了陷入依賴性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性,因為這種發展只會讓大多數農民更加疏遠。政府對坦桑尼亞一直以來對外的高度依賴表示擔憂,特別是考慮到鄰國的製造能力不斷提高。有人認為,在坦桑尼亞獨立之後,出現了一個對外依賴性強但不斷增長的非洲資本主義階級。這一階級為精英集團與外國資本家的動態聯合創造了可能,從而使對前殖民國家的對外依賴性長期存在。

尼雷爾認為,坦桑尼亞在深信現代化理論的同時,過於強調工業化,因為它誤認為沒有工業就沒有發展。這是一個錯誤,因為坦桑尼亞既沒有資本也沒有技術來推動工業。在追求工業的過程中,它把重點放在城市地區,而忽視了農村地區,而大多數坦桑尼亞人都生活在鄉村。1967年,尼雷爾和坦桑尼亞非洲民族聯盟通過了《阿魯沙宣言》,從此坦桑尼亞走上了一條以農業和自力更生為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Nyerere 1968)。

沒有一個非洲黑人民族國家擁有本土的資本家階層。在殖民時期,這也許是一個矛盾。很明顯,國家必須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核心作用,外國投資將發揮關鍵作用。但因為剛剛擺脫殖民主義的國家,非洲對來自西歐的外國資本仍然保持警惕。這與非洲的殖民主義歷史太接近了,並有可能成為恩克魯瑪所說的「新殖民主義」。冷戰時期恩克魯瑪的「積極中立主義」,或尼雷爾的「自力更生」,都被賦予了真摯的願景,這些願景將貫穿於新的經濟模式。資本主義極其緩慢的經濟不會帶來如具有巨大需求的新國家所期望的快速轉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傾向於將非洲歸於蘇聯或東方陣營中。然而,從1955年的萬隆運動中得到了啟發後,新的非洲國家聲稱他們是不結盟的。他們堅持與西方和東方都有聯繫的自由,而不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非洲的新領導人對美國抱有太多幻想,因為美國有能力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需要定制援助方案。蘇聯的援助往往是不固定的,往往是以軍事援助或蘇聯和東歐產品換取非洲商品的形式出現,而這些商品對非洲人來說往往是無用的,蘇聯向幾內亞贈送掃雪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Muehlenbeck 2012:112)。非洲的新領導人轉向美國,因為美國在非洲沒有殖民地,而像甘迺迪這樣富有洞察力的美國政治家發現,非洲領導人更像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意識形態主義者。而非洲的領導人堅持保持中立,因為他們注意到美國更關注那些堅持與兩大陣營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

加納和塞內加爾的經濟狀況比幾內亞和坦桑尼亞都要強。但對於這些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來說,需求水準仍然居高不下。恩克魯瑪的人民大會黨於1951年在加納的第一次大選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在1954年的第二次選舉中獲勝,英國被迫宣佈加納在英聯邦內自治。加納是富裕的英國殖民地之一,從可

哥、採礦(尤其是黃金)和木材中獲得大量收入。但最大的收入來自可哥,恩克魯瑪領導的民族主義政府試圖使經濟多樣化,以避免對單一商品的過度依賴。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英國就建立了一個行銷委員會,將可哥的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掛鉤,並建立一個基金組織,在世界市場價格低於當地提供給可哥種植者的價格的年份時,穩定可哥供應。1952年,恩克魯瑪讓經濟學家劉易斯準備一份關於加納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報告。劉易斯(1953)最終做出了一份「工業化和黃金海岸報告」。在人口眾多的加勒比海和亞洲,劉易斯主張將工業化作為一項發展戰略,但對於人口和土地資源較少的加納,他建議將重點放在農業改良和加強糧食生產上。他建議由外國投資來資助小範圍的輕型進口替代工業,並建議加納政府將其資源投資於農業。為此,加納的民族主義政治家們大為吃驚(Tignor 2006:122-124)。

這些建議對於雄心勃勃的恩克魯瑪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他決心讓加納成為非洲和其他地區的一顆閃亮的明星。他堅持自己的工業化國家願景,但在1957年至1960年間,他努力吸引投資。在加納正式獨立後,成為共和國前,該國越來越多地轉向社會主義政策,並通過國有工業實現國家主導的發展。恩克魯瑪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沃爾塔河專案,並期望阿科松博大壩所產生的廉價電力能夠推動國家工業的發展。劉易斯在加納獨立時加入了恩克魯瑪,擔任他的首席經濟顧問,他煞費苦心地指出,廉價的電力不一定是國家工業化的關鍵。由於兩人對沃爾塔河專案在整個發展計畫中的價值及其成本存在分歧,劉易斯在1958年底辭去職務並離開加納。劉易斯五年發展計畫(1959-1964)於1962年被廢除,恩克魯瑪政府開始醞釀一個社會主義發展計畫,並於1964年啟動。恩克魯瑪對沃爾塔河專案堅持體現了現代化的範式和對其大規模水電計畫的偏愛。但蒂格諾(2006:200-201)認為:

恩克魯瑪對沃爾塔河專案的興趣並不僅僅出於政治表演和個人野心。他也借鑒了大量的經濟著作,這些著作對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水電計畫表示認可,並認為大規模水電計畫有可能產生長期經濟利益。通過產生廉價的電力供應,它們將刺激工業發展並使得工業發展多元化。

恩克魯瑪在1966年2月的一場軍事政變中被推翻,當時阿科松博大壩投入使用僅一個月,所以人們無法知道他本要如何使用加納的電力會。但他在1960年至1966年期間留下了受社會主義啟發、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實踐。

桑戈爾的塞內加爾曾是法國西非聯邦的首都。在這種身份下,它繼承了聯邦政府的管理機構和教育機構以及廣泛的工商業基礎設施。聯邦為塞內加爾以花生油、魚類產品、其他食品工業和紡織品為基礎的工業提供了規模經濟,而桑戈爾最關心的是,隨著聯邦的解體和各州追求工業化,如何為塞內加爾的工業爭取市場(Ndiaye 2008:401-425)。塞內加爾的人口約有80%是農民。花生是主要的出口產品。作為一名詩人,桑戈爾是非洲黑人文化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這是一場藝術和文化運動,是非洲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作為塞內加爾的總統他試圖將這場運動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創造他的非洲社會主義版本,即「民主社會主義」,他認為這是在多個種族和社會群體中發展民族意識的動力,也是推行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的動力(Senghor 1964)。桑戈爾為他的新國家制定的發展議程結合了非洲社會主義和與法國的持續合作,並在堅持平等和聯邦規定的基礎上,塞內加爾不斷嘗試擴大政治實體。比如,短暫的馬里聯邦(1959.1-1960.8),以及塞內岡比亞聯邦(1982-1989)。

非洲社會主義成為加納、幾內亞、塞內加爾和坦桑尼亞等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但每個國家的模式都不一樣，共同點是對政治和經濟自治、自力更生、商業和行政服務的非洲化、泛非洲主義和不結盟的渴望。美國密切關注新獨立的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蘇聯的影響和來自東方集團的投資。美國試圖從非洲新領導人的言論中看出其政治立場。甘迺迪認為對幾內亞的適度經濟援助計畫將改變塞古杜爾的社會主義言論。西方國家認為尼雷爾一個有原則和正直的人，因此他的社會主義試驗得到了西方國家的大量援助。1960年，當美國國務卿克萊斯蒂安·赫特認為恩克魯瑪傾向於蘇聯陣營時，他對此表示反對。但恩克魯瑪的政治，以及他對新獨立國家的解放運動和反對派團體的支持，疏遠了象牙海岸、多哥和尼日利亞等鄰國。許多非洲領導人認為恩克魯瑪不值得信任。而在國內，他變得獨斷專行。美國中央情報局1963年4月17日的一份報告說：「虛榮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加納領導人克瓦米·恩克魯瑪被他的夢想所驅使，他想在一個統一的非洲佔據首要地位，並在不結盟的國家中扮演一個領導角色。」^④桑戈爾儘管以非洲社會主義為職業，但他與法國和歐洲共同市場保持著聯繫，使塞內加爾能夠調動大量的外部資源，從而減少對疲軟經濟進行結構改革的需要」(Ndiaye 2008:421)。

加納的恩克魯瑪、幾內亞的塞古·杜爾、塞內加爾的桑戈爾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這四位領導人都宣稱是「非洲社會主義」。儘管他們的非洲社會主義有共同點，但也有不少差異。美世庫克指出，這些非洲社會主義的嘗試「對共產黨人來說是苦澀的膽汁，他們被教導要直接服用馬克思主義，不加冰塊或阿司匹林」(Senghor 1964:xi-xii)。但這些領導人堅持不僅要有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還要有非洲的社會主義。下一節探討了非洲社會主義在這四個國家的實踐。

三、結論

到20世紀70年代末，米爾頓·弗裏德曼提出貨幣主義經濟學，瑪格麗特·柴契爾出任英國首相，羅納德·雷根擔任美國總統，這標誌著西方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顯然，四位領導人的非洲社會主義政策都失敗了。那麼，從非洲的這段歷史中，有什麼學習的呢？是筆者認為是令人欽佩和值得效仿的大膽而廣泛的變革願景，以及使全體人民擺脫貧困並使他們過上體面生活的願望，尼雷爾的努力就是證明。儘管在這四個政權中，恩克魯瑪的政權是最短命的。但加納資深政治家奧貝德·姚·阿薩莫阿指出，在經濟發展方面，沒有一個政治領導人有恩克魯瑪那樣大膽的想像力。他說：「恩克魯急於實現社會主義，他有很大的野心」(Asamoah 2014:76)。恩克魯瑪的許多計畫雖然未能實施，但在加納後來的各屆政府中得到了延續，而那些仍處於休眠狀態的計畫則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恩克魯瑪不僅規劃了沃爾塔河專案和阿科松博大壩，還制定了位於克蓬(Kpong)和貝(Bui)兩處的大壩建設計畫。克蓬大壩是在阿恰蓬(Acheampong)軍事政權時期(1972年-1978年)修建的，布伊水壩則是在庫福爾總統任內(2000年-2008年)，由中國人開始修建，並在國民民主大會政府時期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是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政府。恩克魯瑪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半阿西尼地區進行石油鑽探，而今天加納在沿海海岸線最西部地區擁有一個產油區。在1962年，恩克魯瑪說服俄羅斯人承諾修建一條從庫馬西到布基納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鐵路。該專案目前處於待啟動狀態，但其潛力巨大(Asamoah 2014:74)。為了增加農業價值，恩克魯瑪於1963年在泰馬建立了可哥加工工廠。雖然加納建設了許多新的公路，但其中很多已經破損。目前來看，恩克魯瑪修建的連接泰馬和阿



克拉的高速公路仍然是加納最好的公路。

到 2050 年,非洲的人口預計將翻倍。目前正在開發的許多礦產財富預計到那時已經耗盡。儘管非洲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未耕種可耕地面積,但它無法實現自給自足。筆者认为非洲人民需要類似尼雷爾和恩克魯瑪這樣的大膽而具有改革性的願景,以確保到 2050 年,非洲人民不會陷入獨立前夕的同樣困境,當時新領導人們脫離了幾十年的壓制性殖民經濟政策,面臨著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戰。

(Editors: Ray & Bonnie WANG)